

概念史范式:毛泽东研究的新视野

李永进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 概念史是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新兴研究范式,它通过分析概念的语义内涵和发展演变,考察其历史语境、思想脉络、内在逻辑及其所构筑的知识体系。将概念史运用至毛泽东研究,可以有效弥补旧有范式的诸多缺陷和不足,实现由人物、事件导向到问题导向的转换,为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方法。目前,概念史在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使用边际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其范式意义的发挥还需要学界共同努力。

关键词 概念史;话语分析;毛泽东研究;范式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18.02.0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命题^①。众所周知,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创新,在于发掘新材料、使用新方法基础上提出新观点。作为中共党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毛泽东长期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对象。尽管与毛泽东有关的文献材料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然而至今已鲜有未被利用者。而受各方面条件制约,新材料的公开又尚待时日。但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研究必须概括新的学术特点,根据未来研究的新趋势。理论创新所带来的视角与方法的转换,同样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向前发展。话语分析视角下的概念史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语言

学转向后形成的新的研究范式,它实现了由人物中心、事件中心向问题中心的转换,有助于弥补传统方法范式的诸多不足,为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可能路径。

一 问题意识:对现有几种毛泽东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检讨

研究范式,主要是指研究者在从事某一领域研究过程中所遵循的某种规范和所体现出的共同特征,包括研究视角、基本线索、主体框架和主要方法。国内外学界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著作种类繁多,视角方法亦不尽相同。其中,革命史范式、权力斗争范式、思想史范式是三种颇具影响力的范式类型^②,它们从不同角度建构起毛泽东研究的解释框架,展现了毛泽东及其思

作者简介:李永进,男,博士,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6CKS005)。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②以上列举三种范式类型,是本文所提倡的概念史范式所主要针对的三种范式,并非对学界所有研究的划分归类,因而难免挂一漏万。事实上,像部分毛泽东研究的年谱、传记、词典、札记类作品,就确实很难划归于这几种范式类型之中。

想的多重面相,但也存在若干结构性缺陷,值得我们深入反思与检讨。

革命史范式长期占据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流,它将毛泽东置于近代中国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之中,以毛泽东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为主线,凸显毛泽东的思想与领导对中国革命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范式以人物为导向,最大的特点是其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着力论证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正确选择和伟大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展开论述的,形塑起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架构,很多概念、表述和判断甚至一直沿用至今。客观来看,革命史范式在很多方面确实具有实在的解释力,但这一范式在研究方法、叙事方式上存在以论代史、将毛泽东的个人论述等同于客观事实等弊端,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学术研究求真求实的价值取向,导致某些叙事与历史真实有某种出入。

权力斗争范式是西方学界毛泽东研究所经常采用的范式类型。这一范式以毛泽东与党内其他领导人(如张国焘、王明、林彪等)进行的政治斗争为线索,将中共党史歪曲为一部“权力斗争史”。它质疑毛泽东的个人行为和道德品质,侧重分析毛泽东在斗争中使用的政治权术,揣测其心理动机,并将此作为相关研究的基本前提。权力斗争范式是事件导向型的研究范式,聚焦于同毛泽东有关的政治事件,如富田事变、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等。权力斗争范式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实际上,不少看似激烈的党内斗争实为“主义之争”,而非“权力之争”^①。所谓“主义之争”,即路线、方针、政策等大是大非问题的分歧、矛盾与冲突,绝不是个人的权力争夺。当然,应该承认在个别时间、个别事件

中,确实不乏权力斗争的因素,甚至一度还导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象的出现,但如果将其夸大为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主要线索和全部内容,则显然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无疑会遮蔽历史的丰富细节和真实面像。因此,类似以学术研究为名恶意诋毁毛泽东形象,歪曲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倾向,值得引起高度警惕。

思想史范式则以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为研究对象,以文章著作为文本基础,考察思想产生的背景、内容和意义。像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党建思想、调查研究思想、外交思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甚至法治思想、救济思想、民生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等,都成为学界乐于研究的对象,相关成果也屡见不鲜。思想史范式有助于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深入细致的认知性研究,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结构主义式的思想分析看似清晰明快,但“一刀切”地将毛泽东的思想分割为条条块块,不考虑其具体时空背景和发展变化,自然也不能展现其中的继承与发展、延续与断裂。萧延中对此评论道:“丰满复杂的历史变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作为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毛泽东,就被从历史的具体语境中剥离出来了,他那原本带有强烈个人意欲的政治动机,就被抽象成某种具有普遍意向的理想图景。”^②另一方面,研究者很容易以自己的思想模式强行套在毛泽东的头脑上,导致不是过分夸大毛泽东思想的某些意义就是盲目批评其没有完成本来就不属于他的历史重任。这种研究与其说是在绘制毛泽东的思想肖像,还不如说是在展现研究者个人的理论图景。英国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将这种倾向称为“预见的神话”,认为其存在不重视思想观念的“历史性”、不去作社会历史语境分析等

①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有“主义之争”的自觉意识,他在1921年1月给彭璜的信中写道:“我觉得吾人只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参见《致彭璜》(1921年1月2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②萧延中:《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一个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缺失^①。

可以看出,不论是革命史范式、权力斗争范式抑或思想史范式,都带有一定的目的论特性,即事先通过设置某种先验的前提预设,进而在材料选取、文献解读等方面向之倾斜,导致很多结论甚至在研究开始之前就已经确定了。这实际上关涉历史研究的一个理论悖论:即作为具有后见之明的研究者常常忽视彼时的具体情形,难以真正走入历史当事人的内心世界,使得某些论断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所以,近年来很多学者提出以“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的态度来研究近现代史,尽可能地减少学术研究的目的论色彩。正如王奇生所言:“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迷恋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主要指观念层面)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②。对上述三种主要范式的反思,使我们有必要在借鉴已有理论体系和解释框架的基础上,探寻其它可能的视角方法作为适当补充,这也构成了将概念史范式引入毛泽东研究的主要问题意识。

二 概念史范式:毛泽东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方法

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是伴随着“语

言学转向”而兴起的人文社会科学新领域和跨学科研究方法。一般认为,它缘起于20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其标志是1955年《概念史文库》的创办以及《哲学历史词典》、《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辞典》、《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等三部概念史巨著的出版。德国历史学家斯特凡·约尔丹(Stefan·Jordan)在解释“概念史”时说:“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和事件史之间。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③国内学界自新世纪以来对概念史研究也日益关注,对其基本内涵、理论预设、主要方法、研究旨趣等做了剖析和解释。关于概念史的内涵,方维规认为:“概念史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中的一个分支,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探讨概念的历史语义。换言之,概念史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彰显其理论假设,即历史见之于一些基本概念;它分析历史经验和理论嬗变的语言表述。”^④孙江则提出,“所谓概念史,就是研究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揭示该时代的基本特征”^⑤,其“狭义内涵是关于词语和概念的研究,广义内涵是关于知识形态的研究”^⑥。黄兴涛指出:“‘概念史’着眼的是‘概念’,关注和究心的却是‘历史’,它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某些特色或重要概念的研究,来丰富和增进对于特定时期整体历史的认知。”^⑦关于概念的理论预设,方维规提出两点:“一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二是这些概念本身有着自己

①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②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③[德]斯特凡·约尔丹:《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④方维规:《概念史方法研究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载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页。

⑤孙江:《代序:概念史与社会史》,载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页。

⑥孙江:《近代知识亟需“考古”——我为何提倡概念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

⑦黄兴涛:《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的历史,走过不同的历史时期。”^①关于概念史的任务,孙江认为概念史要考察“词语的历史;词语被赋予了怎样的政治、社会内涵并因此而变成概念的历史;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词语表述或曰概念在文本中的不同呈现;文本得以生成的社会政治语境”^②。郭若平则提出:“一方面探寻概念沉淀的社会变迁的意义烙印,亦即试图说明社会历史的变迁存在于表述或解释它的各种概念之中,社会的历史记忆可以借助概念而储藏,因此人们了解过往的社会历史,也就可以通过概念分析来实现;另一方面则分析概念自身的变迁史,这种分析旨在说明,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其意义并非固定不变,原始意义与衍生意义并存一体,但遮蔽了差异性。”^③学界的相关讨论,为概念史成为一种可能的研究范式,构筑起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简而言之,概念史就是通过分析概念的语义内涵与发展演变,考察其历史语境、思想脉络、内在逻辑及其所构筑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概念史在传统范式之外,为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和方法。首先,将概念作为考察毛泽东思想历程的主线索,实现了由以人物、事件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换。综观毛泽东的著作文本,可以发现其思想历程几乎就是伴随对概念(或短语)的发明和再阐述而展开的。例如,“民众的大联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支部建在连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六字诀”、“持久战”、“矛盾的主、次要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旧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群众路线”、“三三制”、“三大法宝”、“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联合政府”、“人民民主专政”、“中间地带”、“纸老虎”、“十大关系”、“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等概念,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共同建构起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图景。这些概念中,有的是毛泽东创造的新概念,有的则是他结合时代特征对既有概念做的重新阐释。对此,有学者生动地评价道:毛泽东创造了一些词,颠覆了一些词,救活了一些词,挪用了一些词^④。

其次,以毛泽东的著作文本为基础,对相关概念进行话语分析。概念是话语的核心要素,而“所谓‘话语分析’就是要对那些已经说出来的‘话’到底是以怎样的方式以及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被说出和被传播的过程加以分析”^⑤。对毛泽东研究而言,就是考察某一概念创生的历史语境,梳理毛泽东进行话语建构的历史进程和内在理路,明晰概念的内涵、发展演变及基本逻辑,探讨话语概念的传播认同机制并剖析话语主、客体间的权力关系。以“新民主主义”为例,它是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参与编写的课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首次提出的,在不断阐释、传播和认同的基础上,成为毛泽东革命话语的主题称谓和核心概念。对这一概念进行话语分析,就是要探究毛泽东为什么在此时提出“新民主主义”,其影响因素有哪些;“新民主主义”的内涵是什么,究竟“新”在何处,又经过了怎样的发展演变;“新民主主义”是如何传播并为党员干部、知识界和普通民众等群体所接受的;还需要考察“半殖民地半封建”、“旧民主主义”、“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等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也正是在此思路下,概念也就具有了语义分析意义。

三 运用概念史范式进行毛泽东研究的若干思考

相对于革命史、权力斗争、思想史等传统研究范式,概念史为我们从语言角度深入理解毛

①方维规:《概念史方法研究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载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页。

②孙江:《近代知识亟需“考古”——我为何提倡概念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

③郭若平:《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

④胡松涛:《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5页。

⑤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社会》2010年第2期。



泽东及其思想开辟了一条新路径。目前学界已经日益注意到概念史的范式意义,开始尝试将其运用至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领域,产生了不少颇具启发的学术成果。不过,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概念史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注意。

第一,对历史语境的考察,既要认识时代背景下的宏观语境,也要关注使用概念时的具体语境。这一点对于认知和研究毛泽东极为重要,因为毛泽东是一位语言大师和话语高手,他会根据场合、受众、目的的不同对话语进行巧妙调整。如果不从特定的语境出发,去分析毛泽东话语概念的具体含义,势必会陷入理解的陷阱与误区。试举几例来简单说明。美国学者裴士锋(Stephen R. Platt)认为青年毛泽东的驱张自治是为了“反抗中国干预”,而他提出“湖南共和国”的目标则是寻求建立独立国家,并冠之以“湖南民族主义”(Hunanese Nationalism)的帽子^①。但是,他的著作完全忽视了20世纪20年代“省自治”、“联省自治”的时代大背景。只要稍微对这段历史做些考察,便会知晓这种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呼声,非独出自湖南一省、毛泽东一人,四川、云南、广东、广西、贵州等省份都积极响应,梁启超、胡适、章太炎、李大钊等非湘籍知识分子亦为之奔走呼号。毛泽东在1920年确实高呼“湖南自决自治”,希冀“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但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救湖南救中国”^②。这一“共和国”是独立于北洋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而绝非独立于中国的国家实体,更不存在什么将湖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说法^③。实际上,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自

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因而其“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④。此外,毛泽东对概念的使用也会因时而移、因事而异,在他那里,同一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也会有很大差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民”概念。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什么是人民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⑤1948年,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中提出:“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⑥1949年7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概括了“人民”概念的内涵:“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⑦因此,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概念史考察时,不仅要立足文本剖析话语概念内涵的嬗变,更要注重使用概念的语境,亦即话语概念的背景、场合、受众对象,进而探究其具体语境下的动机和心态,切忌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只有明确这些问题,才能尽可能地还原毛泽东作为话语概念主体的历史现场。

第二,既不能把属于特定时期、特定语境的概念放在其它时期、别的语境中进行分析,也不

① [美]裴士锋:《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② 毛泽东:《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载《湖南自治运动史》(上),泰东图书局1920年版,第145-146页。

③ 汪荣祖:《评〈湖南省的爱国者〉:想象中的湖南独立》,《东方早报》2010年1月11日。

④ 《毛泽东对易礼容来信的按语》,载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⑤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2页。

⑦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1949年7月1日。《毛泽东选集》在收录该文时,将“小资产阶级”改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能把不属于毛泽东的概念,牵强附会,硬塞给他。英国政治思想史学者蒙克(Iain Hampsher-Monk)在分析斯金纳的言语行动理论时指出:“我们必须要把作者的‘语言行动’置于其当时的意义世界”,“在特定的语义或语言管理不可能为一个作者所用的地方,我们就不可能把该作者诠释为正在施行这样的语义或语言惯例,他们的著作也不可能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因为“对于这些作者而言,这些概念范畴完全是陌生的,故而不可能进入他们的写作意图”^①。遗憾的是,学界不少作品偏偏就把这些本应是“陌生的”概念范畴,强加进了毛泽东的“写作意图”之中。比如“三农”“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能否将其简单地套用在毛泽东身上,发掘所谓“理论渊源”“思想脉络”“现实启示”“当代价值”,都是颇值得研究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共同遵循的话语概念,完全不能用来表述其产生之前的问题。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虽然是毛泽东于1939年底才正式提出并加以阐释的,但为了学术研究的便利,我们在很多情形下仍然继续以“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百年近代中国史的划分标准,并将1919年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虽然此时距离“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的提出还有20年的时间。

第三,要特别注意毛泽东著作文本的变动,力求以真史料作为概念史研究的基本依据。众所周知,毛泽东经常对其文章著作进行修改,尤其是在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对所收录的文章都做过较大幅度的添加删改,融入了很多后来的想法和观念。因此,在运用概念

史进行毛泽东研究时,首先便要确定文本是否是真史料。这里的“真史料”有两层意思,一是未经修改的原始文本,它们对于还原毛泽东的本初思想而言是真史料;二是经过修改而成的再生文本,它们虽然不能反映毛泽东的本初思想,但却可以体现话语概念的变化历程,折射出其思想的发展脉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也算得上真史料。例如,1940年2月毛泽东在《解放》所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可以采取“国民大会、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直至乡民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大会选举政府”^②。在《毛泽东选集》版本中则表述为“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至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③。再如,对于毛泽东何时正式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完整概念,很多学者都认为始于他在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依据是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该文有这样的语句:“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④。但经查阅几种原始版本,该句表述中实际上只有“半殖民地的”一词,并没有“半封建的”说法,即“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环境里进行的”^⑤。正所谓“见微知著”,这些看似区别不大的文本差异,却直接折射出毛泽东彼时彼刻的思想状态,需要我们慎思明辨,做一番细致的知识考古。

第四,概念史的研究对象并非单一概念,而是以某个关键概念为核心、包括同义概念、反义概念以及其它相关概念在内的概念体系或概念

① [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59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1940年2月20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⑤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第2页。据鲁振祥考证,1948年5月东北书店版《毛泽东选集》和1949年7月苏北新华书店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单行本,也没有“半封建”的说法。参见鲁振祥:《毛泽东使用和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历史情况的进一步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5期。

群。陈寅恪曾提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①仅仅考察某一个概念的研究，固然有其学术价值，但这种偏重解构的学术趋向却常常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而坠入碎片化的陷阱。这也是学界对以语言分析为特征的后现代理论的主要诟病之一。所以，“概念史的研究对象不是单个的概念，而是一种概念体系的整个表述维度及其来龙去脉”^②。正如谢立中所强调的：一方面要对互有联系的不同话语系统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明晰其相异之处，探讨它们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则要对互相联系的不同话语系统之间的相容性问题进行分析，了解其相通之处，明确它们之间的联系^③。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围绕“新民主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两步走”“群众路线”“人民民主专政”等，共同构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宏大“概念群”，构建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因此，当我们考察“新民主主义”概念时，也要兼顾毛泽东革命话语中的其它相关

概念，以及刘少奇、张闻天等党内其他领导人和国民党、共产国际等政治组织的话语概念。换言之，就是要对这一“概念群”进行整体考释和比较研究，辨明其缘起、流变及其逻辑关系，展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脉络理路和完整面貌。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作为区别于革命史范式、权力斗争范式和思想史范式的范式方法，概念史是毛泽东研究领域理论创新的新鲜尝试，为该领域开辟了一条可能路径。当然，现有研究只是为之开了个头，它在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使用边际、学术成果等诸多方面尚存很大提升空间。因此，概念史最终是康庄大道还是通幽曲径，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和深化毛泽东研究，还有待于学界同心戮力，共同探索。

（责任编辑：马纯红）

①《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2页。

②方维规：《概念史方法研究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载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页。

③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社会》2010年第2期。

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